

中国艺术史图典  
青铜器卷



主编单位：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

Zhongguo Yishushi Tudian

Qingtongqijuan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中国艺术史图典

青铜器卷

主编单位：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

Zhongguo Yishushi Tudian

Qingtongqijuan

上海辞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艺术史图典. 青铜器卷 / 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编.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5326-4795-8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艺术史—中国—图集②  
青铜器(考古)—中国—图集 IV. ①J120.9-64  
②K876.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6914 号

### 中国艺术史图典·青铜器卷

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 主编  
责任编辑 / 王圣良 助理编辑 / 朱译潇  
整体设计 / 姜明 美术编辑 / 杨钟玮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辞书出版社出版  
200040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www.cishu.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16 印张 20.5 插页 2 字数 607 000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4795-8/K·1056  
定价: 148.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69213456

《中国艺术史图典》系列

主编单位 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

总顾问 彭卿云 谢辰生

总主编 刘 炜 段国强

艺术总监 田 村

编 委 (按姓名笔画排序)

田 村 吕成龙 刘 炜 刘 烁 李辉柄 陆晓如

陈丽华 周南泉 单国强 段国强 侯 闽 彭适凡

项目策划 北京东泽博大文化有限公司

《中国艺术史图典·青铜器卷》

主 编 彭适凡



# 总序

今天，摆在读者面前的一部《中国艺术史图典》系列（以下简称《图典》），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艺术殿堂的大门。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不仅善于创造伟大的文明，而且善于把世世代代的文明保护起来、传承下去，使中国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上下五千年不曾间断、纵横八万里不留空白的历史见证。

如此光辉灿烂的文明史，也是一部源远流长、风格独特而鲜明的艺术史。它在全世界独树一帜，自古至今被世人称奇叫绝。

正因如此，参与《图典》编撰工作的文博界同仁们都满怀自信与自豪，以再现历史辉煌、传承历史文明、展示祖先智慧为己任。而今《图典》的出版正是尽这份历史之责的成果。

中国是古人类发源地之一，至迟在距今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祖先在狩猎和采集劳动中萌发了造型能力和审美观念，创造出岩画和装饰品。公元前5000年，位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创造出绚丽多彩的雕塑、绘画和彩陶文明，并且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城市。而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年代大致相当或略晚的东方也开始进入原始社会晚期。原始艺术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北方草原地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异彩纷呈的彩陶和精美的玉器不仅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其实用性与艺术性也达到最完美的结合，表现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智慧与艺术创造力。这些艺术作品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审美观念，在今天看来依然令人震撼，有些甚至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应该说从那个时代起，中华民族追求美的脚步就没有停歇过。

公元前 21 世纪，中华民族终于从蒙昧时代跨入文明殿堂的门槛。夏、商、周三代，奴隶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从初建到成熟，艺术之花犹如夏花灿烂。最具魅力和时代成就的青铜艺术是王权与神权结合的产物。其庄严而瑰丽的造型、神奇怪诞又充满想象力的纹饰、精致而规整的铭文、领先于世界同期水平的先进铸造技术，造就了辉煌的青铜文明，使中国一跃进入世界文明的前列。

公元前 770 年至公元前 221 年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奴隶社会解体、封建社会形成的阶段，政治格局错综复杂，诸侯纷争。文化艺术也呈现出百家争鸣、异彩纷呈的新气象。各种新的艺术形式、艺术思想层出不穷。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楚国漆器艺术，色彩鲜艳，造型夸张，凤鸟形象鲜明生动，充满了巫术和神话色彩，体现了楚人浪漫的、富有想象力的地域特色。青铜器铸造技术中失蜡法和金银镶嵌工艺大量出现，一改商周青铜器庄重规整的面貌，向更加精美的工艺化方向发展。独立的绘画作品——帛画也作为崭新的形式初登舞台。绘画脱离了器物装饰的辅助地位，成为独立发展的艺术门类，更为秦汉时期的艺术繁荣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 221 年至公元 220 年的秦汉两朝是中国进入大一统的帝国时代，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强势都表现在艺术作品上，显示了空前的盛况。雕塑和绘画作品一跃成为艺术的主流，明确显示出艺术创作巩固政权、服务政治的理念。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品是秦始皇陵陪葬的兵马俑群，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和艺术表现力在中国艺术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成千上万的陶俑列队布阵，军容整齐划一，将士肃穆威武，体现出宏大的气势和威慑力，以及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国的雄威，堪称世界艺术奇观。汉代帝陵及诸侯王墓陪葬的陶俑继承了秦代传统，但更多地表现为生动传神的艺术风格，具有很强的生活气息。汉代帝陵遗存的石雕作品，以古朴自然、浑厚豪迈的风格，凸显了汉朝扩展疆域、征服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历史功绩。汉代绘画则以人物画独领风骚，帛画中的肖像画和画像石(砖)中的人物故事画，以细致入微的手法宣扬了儒家观念和道德规范。工艺品中则以贵族奢侈品玉器最为突出。特别是玉器与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结合，把西周初现的礼玉推向了最高峰，也是礼玉最后的辉煌，此后玉器开始向装饰和玩赏的方向发展。因此，可以说汉代玉器是古典玉器的绝唱。

公元 220 年至公元 589 年的魏晋南北朝不到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极盛之世秦汉帝国和隋唐帝国中间的

重要变革期。由于社会和政局陷入了继春秋战国以后的第二次大动荡，造成了人口大迁徙的浪潮，由此形成南北民族大融合、西方文化大量输入中原、中原文化南渐的局面。特别是佛教的传播和流行，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之更加广博而丰富。体现佛教艺术的雕塑造像、壁画在这一时期大行其道，而最具代表性的佛教艺术宝库是北魏鲜卑族皇室开凿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以及由民间力量在丝绸之路重镇敦煌开凿的、号称“中世纪百科全书”的莫高窟。

这一时期的频繁战乱，使得人们的心灵需要慰藉和寄托，而文人士大夫为了摆脱残酷现实的困扰，追求内心的自由洒脱，造成玄学盛行一时，文学对美学产生了巨大的“磁场引力”。寄情山水、书画，是上流社会和文人雅士超脱的最佳方式，由此擅长书画艺术的名家辈出。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画家顾恺之等，都是这一群体的杰出代表。他们开宗立派，创立新格，成为艺术家通过作品表现个性的滥觞。他们留下的作品更成为后世顶礼膜拜的“圣经”。关于书画的评论著作也应运而生，南朝谢赫所著《画品》提出绘画“六法”，以“气韵生动”为最高准则。

公元581年至公元907年的隋唐两朝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国力最强盛、文化最发达的国际化帝国，整个社会洋溢着高昂进取之志与博大豪放之情，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同时也接纳来自东西南北的异域文明，由此造就了一个兼容并蓄、国际文化艺术荟萃的舞台。

如果说诗歌、文学是唐文化的魂，那么唐三彩就是她的华丽外衣。唐三彩瑰丽的色彩、生动多姿的造型以及非凡的美学思想，代表了盛世的风华。此外，书画艺术繁荣，颜真卿、柳公权、怀素、吴道子、阎立本、张萱、周昉等巨匠的书法和绘画作品，造就了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南北朝初现的山水画萌芽此时已经愈发成熟，涌现出了多种流派；而花鸟画、人物画、道释画等更是各立门户，蒸蒸日上。工艺美术也全面开花，特别是对外来文化的积极吸收和融合，反映了大唐社会自由开放的民风。

公元960年至1279年的宋代是重文轻武的时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特别是随着官僚体制的完备、文人



社会地位的提高，全社会重视思想文化，朝野弥漫着浓重的文人气质；加之几代帝王身体力行，文化艺术成就斐然。五代初建的宫廷画院，在宋代成为引领艺术的先锋。宋徽宗和宋高宗不仅本人是具有高深造诣的书画家，而且亲自督导宫廷画院，在全国网罗、招徕行家高手，使画院人才济济。画院的画家们根据皇帝旨意作画，内府院画堪称当时绘画艺术领域的翘楚。书法艺术重意轻法、张扬个性，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蔚成风流。

此外，由于宋代城市商业发达，玉器、金银器、纺织品、陶瓷等服务于皇室宫廷、贵族、文人和平民等各个阶层，具有浓厚的商品经济特点，艺术风格也从唐代的富丽华贵转向清新典雅。尤其是分布于大江南北的瓷业空前兴盛，艺术成就更为显著。四大官窑和五大名窑的瓷器作品多以简约的造型、清雅的釉色取胜，开辟了瓷艺美学的新境界。

宋王朝三百年的政治格局是与辽、金、西夏这些北方强悍民族对峙，军事上很多时候忍让甚至受辱；但其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强大，却足以征服那些军事上的强者。

公元916年至1368年，存在于这个历史时期的辽、金、西夏和元都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些民族的文化艺术与有着悠久历史的汉族相比，显得有些落后。然而，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善于吸收汉文化和其他外来文化的优秀传统，在汉化的同时保留一些本民族的传统旧制，因而在文化艺术领域呈现出别样的风情。这一时期取得最高成就的当属元代文人画、青花瓷和高级锦缎。

在疆域横跨欧亚的元帝国时期，书法和绘画艺术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由于元朝统治者采取民族歧视和分化政策，使汉族士大夫备受压制，宋代活跃的宫廷画院随之解体，取而代之的是皇家倡导的佛教密宗画、肖像画和建筑界画。汉族一些具有相当地位的馆阁士大夫用诗词书画寄托情怀，文人画在他们的推动下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元代中后期号称“元四家”的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代表了一些失意的文人，一反宋代精密细致的写实之风，也不拘泥于以色彩取胜，而是以格调高雅的笔墨情趣，抒发画家的主观情怀，将诗书画融汇一体，增强了绘画的艺术感染力。“元四家”在画坛上作出贡献，成为文人画继往开来的动力。



元青花瓷器的出现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白地青花艺术效果符合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品味，是对优秀汉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同时，其风格又受到西方金属珐琅器的影响。中西结合的青花瓷器深受欧亚两大洲伊斯兰国家的喜爱，具有广阔的贸易市场。可以说，青花瓷器充分体现了元代瓷器制造业继往开来的非凡成就。

辽、金、元三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制作官服。元代政府在苏州设立织造局，还建立了相当规模的织造作坊，专门为制作官服织造一种高级锦缎——织金锦。这种采用金银线加织的锦缎，使官服显得五彩缤纷、豪华富丽，游牧民族的特色十分突出。

公元1368年至1911年的明清两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顶峰。高度集中的皇权政治，使文化艺术表现出浓郁的皇家审美倾向。专为皇室宫廷生产的官窑瓷器成为瓷器新品种、新工艺和高品质的代表。瓷器的实用价值仿佛不再重要，而釉色、造型、纹饰、工艺被发挥到极致，甚至一件杯盏“值钱十万”，价比黄金。金银器、玉器、金属珐琅器、漆器等工艺门类多为皇家所垄断，不惜工本、人力；但由于创作思想上的禁锢，成品往往“工”精而“艺”不高。反倒是一些在野的艺术家，如吴门画派、扬州八怪、嘉定竹刻艺术家，他们更专注于艺术的本体，注重个性的张扬、思想的表达以及表现手法的创新等，由此开启了艺术创作的新天地。这种创作思想延续至今，为现代艺术家们所继承并发扬光大。

## 二

纵观绵延五千年的中国艺术发展史，有四大突出特征贯穿始终。

第一，艺术为政治服务，是政权意识的体现，各个时代最具特色的艺术形式无一不是当时政治的反映。这一点在世界其他古文明中也有体现，例如古埃及的神庙雕刻、狮身人面像等，都属于神权与王权的结合体。但是，它们只是盛极一时，并未形成连续性。而如中国商周时期代表奴隶制时代神权观念和尊卑等级的青铜礼器，虽然在春秋战国以后衰落了，但其理念贯穿在周礼和儒学中，一直到明清依然在皇宫中占据神圣至尊的地位。体现封建社会皇家威仪的龙凤图案最具有生命力，从秦汉直至明清，延续时间长达数千年，甚至影响了其间的许多少数

民族统治者。皇家专享的华丽、尊贵的金银玉石，更是伴随皇室命运于始终。

第二，各地区的文化艺术具有多元化和统一性。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因而各地区在文化艺术上也呈现出多样性。但由于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包容性，各民族的交流、互融十分广泛而频繁，在文化艺术上往往又体现出统一性。例如商代青铜文明发达，大规模的青铜器群大多出现在以商代都城殷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但近些年来，在远离政权中心、自古被视为荒蛮之地的四川广汉三星堆、江西新干一带，同样也发现了发达的青铜文化，在造型、纹饰上具有强烈的地域特点，但在器物种类、铸造技术以及祭祀、礼仪的思想观念上同中原主流文化具有统一性，同样体现了神权与王权结合的理念。

第三，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从青铜器、玉器、陶瓷到书法、绘画，它们首先具有实用价值，其次才是艺术品。而最高境界就是将两者完美结合，那些经典的、被传颂千年的艺术品无不体现了这一特点。

第四，中华民族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为我所用。如来自印度的佛教艺术在中国得以生根、发展，就充分体现了外来文化中国化的进程；它不仅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更为丰富，而且佛教造像、壁画等早已成为中国传统艺术的一部分，并在原有的艺术手法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表现形式。

如此源远流长、波澜壮阔的艺术史，通过一件件承载了丰富而深邃的文化信息的文物展现在世人面前。文物作为历史的遗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见证。青铜器、玉器、陶瓷、书法、绘画以及金银器、漆器、织绣等不仅贯穿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始终，而且最能反映中华五千年文化艺术的特点，有些甚至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它们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完美的中国艺术史。

### 三

这套《中国艺术史图典》系列图书内容丰富。全书包括陶瓷、玉器、青铜器、金银器、书法、绘画、工艺品、服饰造型八大类。全书各卷均以时间为序，以物证史，通过揭示历代经典文物所承载的艺术内涵和丰富的信息，

展现出不同时代的艺术特色及成就，由此折射出文化观念、审美趋向，完整、真实地再现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艺术发展历程。

全书展示的历代艺术精品共1700余件，每一件都是从各地博物馆、考古所等文博机构收藏的千万件文物中精选出的代表作，以及一些收藏在台湾及海外的公认名作，都是最能体现中国艺术发展历程的经典之作。全书将艺术性与学术性完美结合，其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精品之多，在文物类图书中十分难得。

《图典》更为重要的特点是具有权威性。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是本套丛书的主编单位，各卷主编和作者由全国各地的博物馆、考古研究所、大专院校等机构的知名文物专家组成，大多还是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成员；其中很多人都是各专门文物品类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有些甚至被誉为“国宝级”的专家。这些专家学者虽然都肩负着繁重的领导工作或研究课题任务，但他们都很重视《图典》的编撰，全身心投入其中。正是由于汇集了众多文物专家及其研究成果，以及全国各地考古新发现的资料，作品的学术含金量和时代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证。

《图典》的形式固然取决于其得天独厚的内容，但让内容匹配尽可能完美的形式，也是编辑、出版者自始至终的追求。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是文物类图书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现有各卷每卷精选代表性文物图片600~1400幅，规模之大、品类之全、精品之多，为文物类图书出版中所罕见。在编排过程中，我们充分利用最新科技手段，既突显古老文明的庄重、神秘、高雅，又力求赏心悦目。为了适应当今读者多层面、多角度理解图文的需要，编撰者还特意配以“名词点滴”“学术热点”“图版说明”等专题以资辅助。这一形式的编排，也为《图典》增添了亮点。

《图典》在深秋收获的季节里终于面世了。距离当初策划、编写这套图书已过去了十几年。回首往事，不禁感慨系之。由于《图典》的编写工程浩大，当初年富力强的各卷主编和作者们到如今出版之时，大多已经两鬓生霜、耄耋将至。其中《青铜卷》副主编、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青铜器研究专家李朝远先生以及《工艺品卷·织



绣篇》的作者、故宫博物院古代织绣研究专家李英华女士，抱病写作，未能等到著作的出版，就先后病逝，实在令人悲惋！

值此成功之际，我们衷心感谢为编著《图典》付出辛劳、共度艰难的专家学者。现有的成果都凝聚着他们的才智和心血。但愿《图典》的面世，能得到广大读者的肯定和欢迎。这将是十年磨砺之苦的最佳回报！

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

刘炜 段国强



# 导论

青铜是人类较早使用的合金之一。一般铜与锡的合金称锡青铜,铜与铅的合金称铅青铜,铜与铝的合金称铝青铜,铜与铅、锡合金称为铅锡青铜,此外,尚有镍青铜和磷青铜等。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主要是锡青铜和铅锡青铜,古称金或吉金。

青铜艺术,作为一种火与铜、锡合金凝炼的艺术,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有着极其辉煌的、不可磨灭的地位,尤其是狞厉的商周青铜艺术,更以其恢宏的气势、雄奇的造型、怪谲的纹饰和精湛的技艺,给人以美的享受、美的震撼和美的力量。

青铜时代是指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大量使用青铜工具、兵器和用器的时代。“青铜时代”一词,最先为丹麦国家博物馆学者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 1788—1865)提出的,他将该馆藏品,按照材质的不同区分为石器、青铜和铁器三个相互连接的时代,他在哥本哈根出版的国家博物馆参观指南《北方古物指南》一书中,指出青铜时代乃是以红铜或青铜制成武器和切割器具的时代。此后,这种三个时代的区分法为丹麦以外的许多欧洲国家的考古学者所采纳、补充和发展。1941年,英国人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 1892—1957)在赫胥黎讲演时,进一步将青铜时代分为三段模式(modes)。在第一段模式中,兵器和装饰品有用红铜和青铜的合金制作的,但当时还没有“突变”而来的工具,而且专用于工业的工具甚少,石器仍制造得很仔细;第二段模式中,红铜和青铜在手工业中经常使用,但不用于农畜活动,也不用于粗重作业;第三段模式则以金属器具进入农业及用于繁重劳动为特征。这是欧洲青铜时代的一般规律。

中国的青铜时代和欧洲则不尽相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分卷给青铜时代下的定义是“以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张光直认为青铜时代是“指青铜器



在考古记录中有显著重要性的时期而言的。辨识那‘显著的重要性’的根据，是我们所发现器物的种类和数量，使我们对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有中心地位这事实，不容置疑。”也诚如马承源主编的《中国青铜器》一书中所指出的“在中国的青铜时代，则以大量使用青铜生产工具、兵器和大量使用青铜礼器为特征”。这样既把青铜时代和虽已发现青铜但只是少量零星出土且在社会生活中尚未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区分开来，又突出了礼器在中国青铜时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国青铜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用青铜大量铸造兵器。这意味着作为国家机器之一的军队的建立，标志着社会生活的根本变化，原始氏族的彻底解体，奴隶制国家的产生。从中国古代史上奴隶制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程考察，夏、商、周时代也就是中国的青铜时代。

中国青铜时代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用青铜大量铸造容器。在这些容器中有相当部分是用于贵族间的各种礼仪活动，使之成为“礼治”服务工具，成为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标志物。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些容器实际成了“器以藏礼”的礼器。

青铜礼器在商周自身器铭中多称为“彝”或“尊”、“尊彝”，即以钟鼎为代表的“彝器”是宗庙中常设之祭器，而这些祭器也就是青铜礼器。在商周时代，战争和祭祀是贵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两件大事，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需要大量青铜兵器，而祭祀的对象非常广泛，主要包括自然神上帝、天地神祇和先公先王三大方面，商殷时期对先祖的祭祀表现得更为狂热。这些祭百神特别是遥祭先祖的各种仪礼活动，目的是祈求甚或借助百神和列祖列宗来庇护贵族集团的利益和特权，进而维护“世代相续”的统治权力。所以，总结起来说，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大特征，在于青铜的使用是与祭祀和战争分割不开的。用一句最概括的话说：“青



铜便是政治的权力。”这和欧洲青铜时代的特征明显有别，欧洲青铜时代的青铜工艺，除部分作为战争的兵器外，主要表现在社会物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即主要是以作为兵器和切割器具而著称。

在商周时代，不仅贵族集团与庶民之间有严格的等级差别而形成对立的阶级，就是贵族集团内部也有不同的等级，依据不同的等级享有相应的权力和财富。这种等级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贵族阶级对庶民的统治。因此，任何对等级制度的侵犯和挑战，必然引起他们百倍疯狂的镇压，他们也必定会千方百计地去维系等级制度。青铜礼器正是维护这种等级制度的手段。一般地说，各级贵族在使用青铜礼器的种类和数量上都有严格的规定，这是贵族等级和地位高低的标志，如西周时期的列鼎制度就是等级制度的集中体现。

此外，一些青铜重器还是统治权力的象征。相传禹铸九鼎，作为传国重器，商汤灭夏“鼎迁于商”，也作为传国之宝，周克商后“鼎迁于周”，即成王“定鼎郊廓”，“郊廓”就是成周洛邑的王城，显然这九鼎也是周王朝的传国重器，象征周王室的最高统治权力。《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楚庄王傲慢地向周定王使者王孙满“问鼎之大小轻重焉”，王孙满曾不客气地回敬道：“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这都说明相传三代的九鼎一直都是作为统治者权力象征的重器。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证明，中国青铜器的萌生是在公元前21世纪以前的史前龙山时期，也就是铜石并用时代。而中国的青铜时代真正开始是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历经夏、商、西周、春秋、战国，至公元前5世纪前后，大约持续了1600余年。具体来说，中国青铜艺术的发展经历了从初步发展到鼎盛辉煌，之后又经历了急遽变化转为再度繁荣及至最后逐渐衰落的过程。这个发展过程有其自身的承接关系，因而不能以单纯的朝代更替来划分。

夏代(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初期。夏代的考古学文化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故考古学家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在二里头文化诸遗址中，不仅发现有工具、兵器、装饰品和容器、乐器等，还发掘出炼渣、熔铜坩埚和石范、陶范碎片。这些都有力说明从夏代起，我国已结束了新石器晚期以



来的铜石并用时代而进入青铜时代,表明夏代尤其是夏代晚期的青铜铸造已初创规模,各方面的技术条件已日趋育成,并为商代青铜艺术的发展和兴盛奠定了基础。

商代早、中期(公元前16世纪—前13世纪)是中国青铜艺术的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以郑州二里冈遗存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相当于二里冈期的青铜器在中原其他地区还有较多出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较之夏代,不仅工具、兵器和容器的器类及数量大增,而且铸造作坊已具相当规模,铸艺也日趋成熟。此时青铜器上的纹样装饰较为普遍,种类也多,其中最多、最核心的主题纹饰是抽象怪诞的兽面纹,带浮雕的装饰手法也开始出现。商代的礼器是以“重酒的组合”为其特色,和夏代“食酒并重”的体制不同。这种重酒体制在商代早、中期就已初步形成,并且表现出以爵、觚为核心的基本组合形式,商代晚期登峰造极的重酒体制就是商代早、中期重酒礼制发展的必然结果。

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青铜工艺达到鼎盛辉煌,并且成为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的标志。盘庚迁殷后,将近三百年不再迁都,安阳殷墟作为商代晚期的都城,始终是殷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盘庚三传至武丁时期,国力空前强盛,青铜艺术也得以空前发展。殷墟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青铜艺术的成就。武王灭商之后,历经成王、康王和昭王的西周早期,青铜文化的风貌基本承袭殷制,而且保持了商代晚期以来辉煌鼎盛的发展势头。除殷墟之外,山西的吕梁石楼、保德地区,北京的平谷,山东益都的苏埠屯、长清,陕西绥德头村和湖南洞庭湖以南等一些地区都出土有这一时期精美的青铜器,尤其是四川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和江西新干大洋洲等地的青铜器则更集中出土。在殷墟以外各地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不少的形制和纹饰与殷墟无异,表明商文化的强大辐射力,但有的地区的青铜器也反映出某些土著特色,表明它应是殷商时期某个方国的青铜文化,至于四川广汉和新干大洋洲则更明显说明,它们是分处于长江上游和中游的两个不同的方国青铜文明。

商晚至西周早期青铜器的器类和器型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仅以青铜礼器为例,无论是食器或酒器的数量都迅速增多,特别是酒器不仅数量猛增,且出现了不少新的器类,如觥、壶,以及各种方形器,如